

中德關係史文叢

中德關係史研究中心籌備組

趙振玖主編 周振業審訂

中國延設出版社

目 录

序 章文晋 (1)

一次难忘的会见

——1932年与德共中央主席恩·台尔曼(Ernst

Thälmann) 同志的会见 王炳南 (4)

汤若望(G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在中国 梁建华 (8)

德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1842—1932)

..... 赵振玖 崔秀琴 (16)

理夏德·卫礼贤(R·Wilhelm)三论···赵振玖 照 千 (43)

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Hans Shippe)在

山东的活动 董伯先 (69)

* * *

德国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侵略 陈月清 (79)

安治泰(Gean Baptiste Anzer)及其圣言会在德

意志帝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赵振玖 (108)

德国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侵占胶

州湾的野心 周振业 (139)

巨野教案和德军袭取胶州湾 刘善章 (151)

试谈胶州湾事件中之中德交涉 张树枫 (163)

试论德国占领青岛后山东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

..... 李厚基 周 荃 (183)

德国在胶州殖民地的土地政策 照 千 (204)

试谈华德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建立及其

作用和影响 李厚基 (214)

三十年代后期德国对华政策浅析 李兰琴 (230)

* * *

《清史稿》(邦交志·德意志卷)的几则订补 张 明 (243)

附录:

德国在山东军事力量的削弱(摘译) 赵振玖译 (255)

青岛被设为德国的卫戍城(摘译) 颜承汉译 (269)

* * *

后记 赵振玖 (285)

序

章 文 晋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总是要同其它国家接触交往，并相互产生影响与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接触与交往必然也随之加深扩大起来，它不但能够并应该有利于促进本国家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促进各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和德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十三世纪传教士柏朗嘉宾出访蒙古后不久鲁伯鲁克的东来。继之，教士、使节的交往，以及东西方礼品的交换形成了早期的文化交流，十五世纪前后日益众多的西方教士、使节、商人与旅游者的不断地东来，又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经济交流，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工艺绘画以及文化哲学传到了西方的德国，而德国人的东来，对于欧洲的天文、地理、数算科学传到中国，对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国的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诗人和文学家海涅、歌德对中国灿烂的文化 and 哲学思想，倍加推崇，并把它介绍给了德国，在德国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近代，即使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些年代里，德国的商船员工们，也不以英国殖民者的姿态对待中国人，两国人民间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只是在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参与列强的侵华行列，推行其世界性扩张的殖民政策，加速了侵华步伐后，中德关系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侵略压迫和反侵略反压迫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德关系

史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劳动人民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积极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对中国人民寄予莫大的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非常珍视中德人民数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非常珍视德国劳动人民在中国人民面临对国内外反动统治进行艰苦斗争中所给予的深厚情谊，中国人民也深切同情、积极支持德国人民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并一直把这段历史视为发展中德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见证。深入地研究这些充满着友谊、丰富而又变幻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促进中德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团结，发展友谊与合作，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新贡献，是具有极为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这也是我们所以特别重视加强中德关系史研究的主要目的。

近几年来，我国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和提高，但是由于这是一门涉及中德两国历史的边缘科学，它所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所以尽管我们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我们必须承认，中德关系史在目前史学研究中仍然处于较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同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相适应。“中德关系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中德关系史文丛”的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应运而出，它对发展中德关系史研究，必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中德关系史文丛”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专集，它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中德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很值得一读。我认为这本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以丰富的史料辩证的观点，对中德关系史研究中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证和有益的探讨。例如汤若望在中国作出的贡献，德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都作了系统地论述；另外，对传教士也辩证的加以分析，既不一般地把他们视作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不否定其在沟通中德文化上所作的贡献；再如，对德国各个时期对华政策以及在华经济、教育活动、中德交往史实的考证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认真的探讨，虽然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之处，但这个开端是好的，学术研究上的成绩是不小的。二是这本书具有友谊性，这一点从文丛的编辑结构上就可以看出编者的指导思想和尊重中德人民友谊的态度，如编者把有关中德人民友好交往的文章结为一组，置于本书的首要地位，这足以说明其既尊重历史，又尊重中德人民友谊的意图；三是资料丰富，具有教育性，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较为罕见的史料，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证，观点鲜明，说理性强，它使人们从中德关系史的发展中得到知识，汲取教益，所以，这本书是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青岛中德关系史研究中心，为发展我国中德关系史研究作出了一些成绩，是十分可喜的。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向更深、更广处发展，获取新成果，为促进中德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我希望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中德学者的联系和交流，共同研究，共同努力，把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作为发展中德人民友谊的纽带，在学术合作的实践中，谱写中德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一次难忘的会见

——纪念恩斯特·台尔曼诞辰一百周年

王炳南

1986年4月16日，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恩斯特·台尔曼诞辰一百周年。在纪念台尔曼同志诞辰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1932年秋天在柏林同他一次会见的动人情景。当时，他那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富有预见性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事隔五十四年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我是1931年春到达柏林的。当时的德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中。以台尔曼为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正在为争取德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阻止希特勒法西斯攫取政权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当时的德国共产党是合法的，它在全国是第四大党。第一大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但是，德国共产党在首都柏林和最大的海港城市汉堡却是第一大党，因此，那里被人们分别称之为“红色的柏林”和“红色的汉堡”。尽管法西斯势力在这一时期已相当猖獗，但是在德国工人群众中，德共仍然有着很大影响。例如，1932年3月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一次总统选举中，德共的总统候选人台尔曼同志仍然获得了五百万张选票。

当时，我在德国是德共的党员。我们中国同志被编在中国语言组里过组织生活。中国语言组属于双重领导，一方

面属于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同时又从属于德共中央领导。我刚到德国的时候，中国语言组的负责人是张翥和成仿吾同志。不久，他们相继离开德国，分别前往莫斯科和国内中央苏区。接替他们担任中国语言组支部书记的是谢维进同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中间也积极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在德国成立了“反帝同盟”、“社会科学研究社”和“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性的组织。1932年夏，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杨秀峰同志前来柏林检查中国语言组的工作。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对中国语言组支部的领导进行了改组。杨秀峰同志指定我担任支部书记，江隆基同志负责宣传工作。另外还有一位从法国来的辛安石同志。我们支部的领导班子组成后不久，德共中央负责同我们联系的联络员奥托同志便通知我们，台尔曼同志要接见中国语言组支部的新领导成员。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尽管在此以前我们曾在柏林的鲁斯特公园体育宫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多次看到过台尔曼同志，并且听过他的演讲。但是，多么想有机会能单独见见这位德国工人阶级领袖，并聆听他的谆谆教导！此外，当时德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日理万机的台尔曼同志竟能在百忙中专门接见我们中国同志，我们大家都被他的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

1932年8、9月间的一天，德共中央主席台尔曼同志在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总编辑部会见了我们。台尔曼同志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运动，一见面就询问中国革命的情况。他说，德国工人阶级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革命发

展的每一个进程。德共将竭尽全力支持与声援中国革命，为此德共提出了“不准干涉中国！”的口号。他强调指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进行的革命斗争在国际上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接着指出：拿破仑曾讲过这样的话，亚洲的中国象一头睡狮，让它好好睡着吧，如果这头狮子醒来的话，会使世界震惊的。这时，台尔曼同志满怀激情地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中国这头睡狮摇醒了！接着，台尔曼同志又说，据他了解，中国革命曾建立过广州公社，最近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目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他认为，中国革命即使取得了小小成就，或者遭到了小小挫折，对德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可以借鉴的。因此，他建议中国语言组的中国同志在参加德共的街道支部会议时，要向德国同志多讲讲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教训。台尔曼同志还说，虽然今天德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不同，德共今天是合法的，正在进行合法的斗争。但是，目前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在蠢蠢欲动。今天我们的党虽是合法的党，在进行合法的斗争，而将来也可能要转入地下，搞非法斗争。因此，中国同志应多讲讲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使德共的同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台尔曼同志还建议中国语言组支部指定专人给《红旗报》撰写一些介绍中国革命的文章。

台尔曼同志在谈话中，还提到有一位从德国回去的中国同志，现在正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工作。我对他说，那就是朱德同志，他曾在格丁根大学学习过。现在，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中国革命。

最后，台尔曼同志还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说，如有什么困难。可向联络员奥托同志提出来，他会尽力帮助解决。

自从我同台尔曼同志这次会见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这位德国工人阶级领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他对我国革命和对我国人民满腔热情的关怀。我永远不会忘怀。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捍卫世界和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努力工作着，战斗着。我们将以这一伟大斗争的宏伟成就告慰中国人民的朋友台尔曼同志。

(1986年4月)

汤若望在中国

梁建华

汤若望，字道未，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德意志人，是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曾任清朝的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多年，负责观察天象和编制历书的工作，对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四十余年，于1666年8月15日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回顾中德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历史时，人们情不自禁地缅怀这位在三百年前曾将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到中国的德国友人。

（一）

汤若望于1591年5月1日生于（今联邦德国）科伦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系罗马人血统。1608年，他中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到罗马入德意志学院学习，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3年进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和神学。在学习期间，汤若望受来华传教士利玛窦^①等人寄往欧洲的有关中国情况的信件以及利玛窦撰写的一部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宗教和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札记》^②的影响，对中国满怀美好的憧憬。1616年1月2日，他向罗马耶稣会新总会长提出申请，决心毕业后“到中国去”^③进行传教活动。

1618年4月，汤若望从葡萄牙乘船，踏上了来中国的艰难航程。1619年7月（万历四十七年），抵达澳门，进入了那里的宗教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1622年（天启二年）夏秋之交，汤若望离澳门，经广东、江西和浙江等地，于1623年（天启三年）初到达北京。在北京逗留期间，他将由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为目录，呈递朝廷，并将带来的科学仪器陈列展出。他还根据欧洲历书^④上关于1623年10月8日将会发生月食的记载，通过计算罗马子午线圈同北京子午线圈的距离，正确预报了这次月食在北京发生的具体时间。此外，他还为预报1624年9月将要发生的一次月食，撰写了有关确定月食时间及其他天文知识的书籍。由于明初以来我国使用的《大统历》谬误越来越大，“交食往往不验”^⑤，因此，汤若望对两次月食的正确预报给当时中国的学术界以很大震动。1626年（天启六年），汤若望发表了汉文小册子《远镜说》，论述了望远镜的功能及其制造法^⑥。这距离伽利略1608年开始在西方使用望远镜，其间不过十八年。八年之后（1634年，崇祯七年），汤若望与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⑦又将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一架望远镜献给了崇祯皇帝。

1627年（天启七年）夏秋之交，汤若望被耶稣教会派往西安。在此期间，他测定了西安在地图上的经纬度，并且观测了1628年（崇祯元年）1月21日的月食。

1629年（崇祯二年）6月21日的日食，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刻数不确，预报错误明显。这促使崇祯皇帝下决心命令中国科学家徐光启^⑧组织历局，着手修正历法。1630年秋，汤若望奉召从西安来京，参加了历局的改历工作。以汤若望为主^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李天经^⑩的领导和合作

下,经过五年的努力,为明朝政府修撰了一套用欧洲新科学方法编成的天文和数学百科全书,定名为《崇祯历书》。但是,由于明末政治腐败,《崇祯历书》编成后并未用来编历。汤若望和罗雅谷还制作了浑天仪、园规、望远镜、小号天体仪和星高机等各种天文仪器,并装饰成中国式样献给中国皇帝。1636年满族入侵,威胁了北京安全。明朝政府命令汤若望监造大炮。为此,汤若望参考有关书籍,成功地铸成了二十门四十磅重的大炮,并制造了可以放在马背和骆驼背上运走的轻型大炮。他在这期间与徐光启学生焦勛合译的《火攻挈要》,是我国军事技术史上的重要著作。为表彰汤若望和罗雅谷在天文学和制造火器方面的功绩,崇祯皇帝曾敕颁金匾一块,亲题“钦保天学”四个大字。礼部也赠送金匾一块,上写“功堪羲和”,意思是说,这两位科学家的功勋可以与我国荒古神话时代传说中的伟大学者羲和相媲美。

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汤若望把《崇祯历书》修改压缩,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当清朝的统治者知道新历法的优点和汤若望于明末在天文历法上作出的贡献以后,就于1644年(顺治元年)底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并把他为下一年编制的民用历书命名为《时宪历》^①。该历法从1645年(顺治二年)颁行,中间经过小的修正,一直施行到1911年清朝灭亡。汤若望是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个外籍人钦天监监正^②,当时的顺治皇帝对他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功绩非常赞赏。为了表彰汤若望在改革历法方面的丰功伟绩,顺治时期的清政府于1653年4月曾赐予他“通玄教师”(天文学专家)的称号。接着,1658年2月又封他为光禄大夫,使其成为清朝的第一级正品官员。

(二)

天文历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有着辉煌的成就。我国元代伟大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通过对天象进行实际的观测和精密的推算，算出一年有 365.2425 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只差26秒。他编制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周期相同，并比现行公历的确立还早三百多年。但是，从明初（1368年）到明万历年间的二百年中，中国的天文历算很少有什么发明创造。明初以来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授时历》改的名，内容完全一样。由于长期没有修历，在1610—1629年（万历三十八年——崇祯二年）的二十年间，《大统历》的误差积累越来越大，对于日月交食的预测往往不准确。正在这时，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把欧洲在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后而发展起来的天文、数学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的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⑧。从此，中国的天文学开始了同西方天文学的融合时期。

汤若望撰写的《西洋新法历书》和据此而编制的《时宪历》同我国的旧历法相比有那些不同呢？

我国《授时历》和《大统历》采用的计算方法主要是三差内插法。例如在计算较复杂的天体运动轨道时，把轨道分成几段，每段以观测为基础，定出一个特殊值，然后求出这些值之间的一次差数、二次差数和三次差数。根据这些差数，用三差内插公式^⑨来计算所要求的值。这些内插公式本身，从数学上讲大都是正确的，是我国数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但是在《授时历》中要求把从实测定出的各个特殊值的尾数加以调整，以实现“整齐分秒”。这样一来，就使数据的

误差增加了。由于调整的只是尾数，因而在刚修订时与实际尚相去不远，但日子一久，积累起来，误差就大了。汤若望编制的《西洋新法历书》的优点首先是去掉了“整齐分秒”的做法，避免了人为地制造误差。同时，《西洋新法历书》采用的是第谷（Tyche Brahe, 1546—1601）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第谷体系是介于近代哥白尼（1473—1543）日心体系和中世纪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的宇宙体系。它的结构是：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月、日、恒星等都围绕地球这个中心旋转，其他五星则都绕太阳运动。这个体系和中国古代占主要地位的浑天说宇宙模型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其次，《西洋新法历书》的优点在于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和其他计算中，较旧的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第三，《西洋新法历书》应用球面三角学，消除了计算本身的误差，并且大大扩了解题范围。此外，《西洋新法历书》还采用了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即分周天为360度，分一日为96刻（24小时），度和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这也是科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因此，《西洋新法历书》在当时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言历者莫不奉俎豆”。^⑤

（三）

汤若望担任清朝钦天监监正期间对我国历法的改革受到中国保守落后势力的破坏和阻挠。守旧派“坚其安习溺闻之陋”而不肯接受新历法。例如，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封建士大夫坚决反对汤若望等人传入的欧洲先进科学技术。1660年，杨光先发表了《辟邪论》^⑥首先向汤

若望发难。该文诬蔑汤若望“传布舛谬虚妄的天算学说”，称他的新历法有“十谬”。杨光先是个不学无术之徒^①，他对汤若望等人宣传的“地圆说”极尽诽谤之能事。他在后来发表的《不得已》一书中说：“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② 1664年，杨光先甚至使用政治陷害手段诬告在钦天监工作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妄言惑众”和“阴谋不轨”。当时清政府竟根据杨光先的诬告罢了汤若望的官，并把他同南怀仁^③、利类思和安文思三位传教士一道投入了监狱。这次冤狱使七十四岁高龄的汤若望在身心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幸亏后来康熙很快亲政，立刻翻了这个案。为给汤若望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康熙决定将杨光先革职查办，并为在审讯中病逝的汤若望重新举行“祭典礼”。1669年12月8日（康熙八年11月16日），康熙亲自为汤若望选拟祭文^④以示悼念。

汤若望是作为传教士来中国的，他同三百年前来华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带往中国，是为了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以达到传教的目的。然而，汤若望在中国的四十余年里，除传教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介绍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上：他主持编制的《时宪历》在我国的天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期，他负责编译的科学专著有《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新法算术》、《几何要法》、《远镜

说》、《星图》、《火攻挈要》和《西洋新法历书》等，达数十种之多，这些专著对于发展我国的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和地理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尽管汤若望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中国同欧洲仍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他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我国天文学的发展的功绩是值得人们称颂的。中德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温故而知新，我们坚信这种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①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传教士，1583年来华。积极介绍欧洲的先进科学，著译有《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等，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

②又名《基督教流传中国记》，1613年由耶稣会士金尼阁带往罗马。金尼阁增补了几章，并将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刊行问世。^①该书是欧洲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专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②

③参见：魏特著《汤若望传》上册，194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0页。

④欧洲从1582年改用新历，即格雷高里历。

⑤《明史》卷三十一，《历志》。

⑥汤若望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佐耳佐目之法，皆不可废。”“佐目者利物出于人力，其巧妙诚有可得而言者。无可得而言者言之则诬；有可得而言者言之则欺。此《远镜说》之所由述也。”（转引自渠家勉编著《徐光启年谱》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58页。）

⑦罗雅谷(Giacomo Rho, 1593—1638)意大利传教士，1624年(天启四年)来华。

⑧徐光启(1562—1633)，中国明末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学、数学和农学方面都有重要贡献，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知识的积极推动者。1629年组织历局，领导了一次重大的改历活动。临终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⑨历局成立后，先后聘请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和汤若望参与工作。邓玉函是瑞士人，龙华民是意大利人。他们在汤若望之前仅参加过短期工作。

⑩李天经(1579—1659)，进士，历任河南、陕西藩臬。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负责历局的改历工作。

⑪《时宪历》即通常说的旧历，又称夏历或农历。